

# 马克思早期关于人的本质的思想演变

孙昌育 涂赞琥

## (一)

马克思说：“思辨终止的地方，即在现实生活面前，正是描述人们的实践活动和实际发展过程的真正实证的科学开始的地方。”<sup>①</sup>这段话十分准确地表述了德国思辨哲学与马克思所创立的新世界观的区别，后者是对前者的否定，前者的终结也就是后者的确立。我们知道，马克思最初信奉黑格尔哲学，《莱茵报》的实践活动，使他对黑格尔的那种充满学究气的思辨哲学感到厌倦和怀疑，从而使他离开黑格尔走向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费尔巴哈虽然批判了黑格尔的理性思辨，处处强调感性，但他的哲学的核心——人——仍然是抽象的、非现实的，并没有真正克服黑格尔的思辨性。而且用这种人本主义来论证共产主义，的确是苍白无力的。要建立起科学共产主义学说，首先要建立起真正科学的社会历史观。这种新世界观，其出发点不能是形而上的、用抽象理性所规定的所谓人的本质，而应把形而下的、用经验可以观察到的现实活动着的人作为出发点。

从马克思早期对人的本质的探讨来看，可以分为两个阶段。一是从《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到《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这一阶段，一方面是马克思关于自己的人学思想逐步建立的时期，另一方面也是逐步摆脱德国古典哲学影响的时期。因此在这一时期，必然出现“新的缠住旧的，死的拖住活的”的现象。第二阶段是《费尔巴哈提纲》和《德意志的意识形态》的写作时期，也就是马克思的人学思想的完全确立时期。在这一阶段，没有关于人的本质的抽象的形而上的规定，而是把人置身于现实的“物质生产条件”和“一定的社会关系”之中。这时，马克思已从思辨哲学的笼罩下解脱出来，开始了他的形而下的实证科学研究。

## (二)

马克思的人学思想的转变是从1843年夏天对黑格尔法哲学的批判开始的。他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这样说：“抽象的人只是作为法人即社会团体、家庭等才把自己的人格提高到真正存在的水平。但黑格尔却不把社会团体、家庭等一般的法人理解为现实的经验的人的实现，而是理解为本身只是抽象地包含着人格因素的现实的人。正因为这样，在黑格尔那里不是从现实的人引伸出国家，反倒是必须从国家引出现实的人。”在这里，马克思认为，相对于国家、市民社会、家庭来说，人是更为根本的，是人产生出国家、市民社会和家庭，而不是

相反。“黑格尔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他想给抽象的实体、理念写传记，于是人的活动等等在他那里就一定变成其他某种东西的活动和结果。”<sup>②</sup>毫无疑问，黑格尔把劳动看作人的本质、把现实的人理解为他自己劳动的结果，整个人类历史也是人的活动的结果，那么，国家、家庭等伦理单位，当然是从人的活动中产生的。但是根据黑格尔的逻辑，越是排列在后面的概念，越是丰富，越是具体，也越是具有真理性、根本性，因而家庭、市民社会、国家这些产生在后的概念反而决定着产生在先的“人”。它们如同亚里士多德的形式因、动力因和目的因一样，驱使着作为质料因的人们去从事活动，由此导致黑格尔“不是从现实的人引伸出国家，反倒是必须从国家引伸出现实的人。”

马克思虽然批判了黑格尔的这种唯心主义的颠倒，但这时的马克思似乎对黑格尔关于劳动是人的本质这一深刻思想还未予以足够的重视，因为马克思这时仅仅把人的本质理解为一种社会特质。我们从《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的这样一段话就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一点：“国家的职能和活动是和个人有联系的（国家只有通过个人才能发生作用），但不是和肉体的个人发生联系，而是和国家的个人发生联系，它们是和个人的国家特质发生联系的。”黑格尔“忘记了‘特殊的人格’的本质不是人的胡子、血液、抽象的肉体的本性，而是人的社会特质，而国家的职能等等只不过是人的社会特质的存在和活动的方式。因此很明显，个人既然是国家职能和权力的承担者，那就应该按照他们的社会特质，而不应该按照他们的私人特质来考察他们。”<sup>③</sup>显而易见，马克思把家庭、市民社会、国家等社会形式看作是“人的本质的实现，看做人的本质的客体化……这些组织也表现为人的现实普遍性，因而也就是一切人所共有的。”<sup>④</sup>

这时马克思把人的本质理解为一种社会特质，而这种社会特质是与国家的职能和活动相联系的，因而也就是把人理解为一种社会动物或政治动物。马克思不象费尔巴哈那样，把人理解为抽象的、生物性的人。马克思虽然在人的本质问题上超过了费尔巴哈，但也仅仅从政治法律、伦理的角度来理解人的社会特质，而没有把人的生产劳动和物质生活条件作为考察人的基础。

但我们也不能忽视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的这样一句话：“黑格尔想使人的本质作为某种想象中的单一性来单独活动，而不是使人在其现实的人的存在中活动。”<sup>⑤</sup>说明这时的马克思已经对思辨哲学从虚构的公理（人的本质的抽象规定）出发感到不满，要求把人置于现实之中。形而上向形而下的转变已初见端倪。

1844年1月，马克思写了《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但在人的本质问题上并没有任何重大突破。马克思仅仅提到“人并不是抽象的栖息在世界以外的东西。人就是人的世界、就是国家、社会。”<sup>⑥</sup>这与《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一样，仅仅强调了人的社会性。虽然马克思在《导言》中论述了时代的中心问题即社会主义问题，规定了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但无产阶级自身解放的依据仅仅“是从宣布人本身是人的最高本质这个理论出发的”。<sup>⑦</sup>因为现实社会“表现了人的完全丧失，并因而只有通过人的完全恢复才能恢复自己。”<sup>⑧</sup>马克思这时对于社会历史观的根本问题即人的问题并没有建立在实证科学的基础上，还没有从旧哲学的关于人的一般本质的抽象思辨中解脱出来。人的本质是什么呢？马克思回答说：“人的根本就是人本身”。并且把这种人本主义作为无产阶级解放的哲学依据，“对宗教的批判最后归结为人是人的最高本质这样一个学说，从而也归结为这样一条绝对命令，必须推翻那些使人成为受屈辱、被奴役、被遗弃和被蔑视的东西的一切关系。”<sup>⑨</sup>这实质上是把社会主义建立在伦理学公理的基础上。可见，马克思这时的人学思想和社会主义思想还没有以实证科学为基础。

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马克思这时已经认识到，批判黑格尔的法哲学和国家哲学，“并不

是针对原本，而是针对副本。”<sup>⑩</sup>所谓“原本”，也就是决定国家和法的现实的经济关系。于是马克思开始研究政治经济学，分析资本主义的经济关系，而这正是马克思关于人的本质的研究从形而上到形而下的转折点。

1844年4~8月，这是马克思的思想大飞跃的时期。由于马克思对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使马克思认识到黑格尔关于劳动是人的本质这一思想的深刻之处，他说：“黑格尔的《现象学》及其最后成果——作为推动原则和创造原则的否定性的辩证法——的伟大之处首先在于，黑格尔把人的自我产生看作一个过程，……他抓住了劳动的本质，把对象性的人、现实的因而也是真正的人理解为他自己的劳动的结果。”<sup>⑪</sup>

不仅如此，马克思还认识到：黑格尔虽然把劳动看作是人的本质，但“黑格尔只知道并承认一种劳动，即抽象的精神的劳动。”<sup>⑫</sup>“把宗教或者诸如政治、艺术和文学等等这样一些抽象普遍形式的历史，看作人的本质力量的现实的人类的活动。”<sup>⑬</sup>马克思批判了黑格尔对劳动的这种唯心主义看法，明确把“工业看作人的本质力量的公开的展示。”<sup>⑭</sup>“工业的历史和工业的已经产生的对象性的存在，是人的本质力量打开了的书本，是感性地摆在我们面前的，人的心理学，……那种还没有揭开这本书，亦即还未触及历史的这个恰恰从感觉上最容易感知的，最容易理解的部分的心理学，不能成为真正内容丰富的和现实的科学。”<sup>⑮</sup>“宗教、家庭、国家、法、道德、科学、艺术等等，都不过是生产的一些特殊的形态，并且受生产的普遍规律的支配。”<sup>⑯</sup>马克思明确把劳动看作是工业的活动，看作是生产劳动，这是马克思思想发展史上的重要的理论突破，这一思想在唯物史观的建立过程中具有决定性的意义。正如恩格斯后来所说的：马克思主义“在劳动发展史中找到了理解全部社会史的锁钥。”<sup>⑰</sup>

黑格尔把劳动看作是人的本质，因此黑格尔在研究人的本质的一个重要的方法论原则，即在人的自我创造的历史过程中去理解和把握人的本质。深刻的历史感，这是黑格尔哲学的重要特点之一。马克思在批判地继承黑格尔关于劳动是人的本质这一思想时，同样地遵循着这一方法论原则。

马克思说：“通过工业而形成——尽管以一种异化的形式——的那种自然界，才是真正的，人类学的自然界。”因此，“全部所谓世界史不外是人通过人的劳动的诞生，是自然界对人说来的生存，所以，在他那里有着关于自己依靠自己本身的诞生，关于自己的产生过程的，显而易见的，无可辩驳的证明。”<sup>⑱</sup>

这就是说，人的本质是劳动，这种劳动（即工业），也就是生产劳动。这说明，人的本质并不是由少数哲家用抽象的概念来加以规定的、万古不变的单个人所具有的抽象物，而是与生产的发展相联系的。人类生产的发展也就是人的本质的展示。

然而，这时的马克思并未完全摆脱德国思辨哲学的传统影响。在《手稿》中，马克思的新思想并没有贯彻到底。一方面，马克思认为工业是“人的本质力量的公开展示。”另一方面，马克思与费尔巴哈一样，都认为人类具有共同的、抽象的“本质”。只不过，这种本质不是费尔巴哈所规定的知、情、意，而是被理解为自由自觉的生命活动。“生命活动的性质包含着一个物种的全部特性，它的类的特性，而自由自觉的活动恰恰就是人类的特性。”<sup>⑲</sup>马克思把人的本质理解为“自由自觉”的活动，这实质上是一种理想化了的、现实中和历史上都从来没有过的“人”。因为在人类社会，所谓“自由自觉的活动”是极其罕见的，只有少数诸如文学、艺术、哲学、科学等创造性活动也许是如此，而从事物质生产的大多数人并不能从他们那单调、重复的活动中感到自由和享受，因为这是一种求生存的活动。

在《手稿》中，马克思试图把人的解放建立在生产力发展的基础上，他说：“自然科学通过

工业日益在实践上进入人的生活、改造人的生活，并为人的解放做好准备。”<sup>②⑩</sup>但另一方面，马克思又用人的本质的复归来论证他的共产主义思想，“共产主义是作为否定之否定的肯定，因此它是人的解放和复归。”<sup>②⑪</sup>“共产主义是私有财产即人的自我异化的积极的扬弃，因而也是通过人并且为了人而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因此，它是人间作为社会的人即合乎人的本性的人的自身的复归。”<sup>②⑫</sup>这又与《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的对共产主义的论证如出一辙，都是用人的本质的重新占有、复归来作为共产主义的依据。从这里可以看出黑格尔著名的正、反、合三段论的影响和费尔巴哈人本主义的影响。

马克思这时的思想不仅在表述上和用语上是不成熟的，而且在内容上也是不成熟的。这种不成熟主要表现在马克思还没有完全抛弃思辨哲学中的形而上的东西，没有真正从形而下的，可以用经验观察到的东西出发，新的实证科学与旧的思辨还混杂在一起。

### (三)

到了1845年春天，马克思的思想全然不同了。他在《费尔巴哈提纲》中完全抛开了旧的思辨哲学(包括费尔巴哈哲学)关于人的本质的抽象的形而上的规定，明确指出：“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sup>②⑬</sup>马克思这时已不再提出一种脱离历史的抽象假定作为人的本质，也不把人的本质理解为一种所谓的“类”即共同性，而是把它理解为一种社会关系，这种社会关系并不是静止的、不变的，而是变化的、发展的。社会关系产生、发展的根源在哪里？在于人们的社会实践。“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sup>②⑭</sup>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马克思就提出人的本质不在于自然属性，而在于它的社会性。而到了《费尔巴哈提纲》，马克思已明确地把人的社会性理解为人的活动的社会性。社会实践既创造出新的环境，也改变着人本身。

旧的唯物主义在历史观上一方面认为人是环境和教育的产物，但另一方面，当人们问环境又是由什么决定时，他们又得出“意见支配世界”的唯心主义结论。他们在环境和意见的相互作用中陷于无法解脱的二律背反。马克思则在《费尔巴哈提纲》中明确指出：“环境的改变和人的活动的一致，只能被看作是并合理地理解为革命的实践。”<sup>②⑮</sup>环境总是变化的，而决定着人的那个环境的变化又是由人的实践活动所造成的。

恩格斯高度评价这一《提纲》，认为它是“包含着新世界观的天才萌芽的第一个文件。”在此之前，马克思对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评价很高，而且运用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来论证共产主义。而在《费尔巴哈提纲》中，马克思第一次批判费尔巴哈的人学观，批判了费尔巴哈离开社会实践去理解现实的人，把人仅仅归结为抽象的，不变的类。但在这里，对费尔巴哈人学观的批判仅仅只是一个纲要，真正对费尔巴哈人学观进行深入、细致、全面地批判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

如果说《费尔巴哈提纲》中还有一点形而上的影子的话(因为马克思还在使用“人的本质”这类形而上的概念)那么《德意志的意识形态》则是完全从感性的社会存在出发的。“德国哲学从天上降到地上，和它完全相反，这里我们是从地上升到天上，就是说，我们不是从人们所说的，所想象的、所设想的东西出发，也不是从只存在于口头上所说的，思考出来的，想象出来的，设想出来的人出发，去理解真正的人。我们的出发点是从事实际活动的人。”<sup>②⑯</sup>

费尔巴哈和黑格尔都认为他们所考虑的人是现实的人。费尔巴哈把他的感性的人，即仅仅在感情范围内承认的人称为“现实的，单独的，肉体的人”。黑格尔也说“精神作为一个自我

意识亦作为一个现实的人存在在那里。”虽然他们都把自己所考察的人当作现实的人，但是他们仅仅从精神或抽象的感情来考察人，而不是从人的实践活动，生产活动和人的物质生活条件来考察人。费尔巴哈的宗教本质和黑格尔的绝对精神是他们哲学的出发点。这是一种超验的形而上学，马克思把它们讽刺为高高在上、远离尘世的东西。

毫无疑问，马克思认为，人是历史的主体，社会历史的前提是人，但这种人“不是某种处在幻想上，与世隔绝的，离群索居状态的，而是处在一定条件下进行的、现实的、可以通过经验观察到的发展过程中的人。”<sup>②7</sup>马克思在这里不再谈论超验的，形而上的所谓人的本质了，而是直接从人的活动，从物质生产出发来说明社会历史。因为如果仍象费尔巴哈那样离开人的现实活动和物质生活条件来考察人，那么这个“人”只可能是现实中不存在的抽象物。这一点恩格斯说得很清楚：“只要‘人’的基础不是经验的人，那末他始终是一个虚幻的形象。”<sup>②8</sup>

而马克思“要谈的前提并不是任意想出的，它们不是教条而是一些只有在想象中才能加以抛开的现实的前提。这是一些现实的个人，是他们的活动和他们的物质生活条件，包括他们得到的现成的和由他们自己的活动所创造出来的物质生活条件。因此，这些前提可以用纯粹经验的方法来确定。”<sup>②9</sup>他们的活动和物质生活条件，归根结底也就是他们的物质生产。因为“一切人类生存的第一个前提也就是历史的第一个前提，这个前提就是：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但是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衣、食、住以及其他东西。因此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同时这也是人们仅仅为了能够生活就必须每日每时都要进行的（现在也和几千年前一样）一种历史活动，即一切历史的基本条件。”<sup>③0</sup>在这里，马克思所理解的劳动，是物质生产活动，是人类为了自身的生存和繁衍而不得不从事的活动，并不是一种所谓“自由自觉”的活动。

费尔巴哈不注重研究人们的生产活动和物质生活条件，孤立地去探寻所谓“人的本质”。马克思认为：“费尔巴哈谈到的是‘人自身’，而不是‘现实的历史的人’……他没有看到，他周围的感性世界决不是某种开天辟地以来就已存在的、始终如一的东西，而是工业和社会状况的产物，是世代活动活动的结果，其中每一代人都在前一代所达到的基础上继续发展前一代的工业和交往方式，并随着需要的改变而改变它的社会制度。甚至连最简单的‘可靠的感性’对象也只是由于社会发展，由于工业和商业往来才提供给他的……。”<sup>③1</sup>

诚然，马克思也谈到了消灭异化的问题，但马克思使用“异化”一词仅仅是因为它是哲学家易懂的语言。马克思这时对思辨哲学中的形而上概念已没有任何兴趣，因为新的历史观所使用的一整套范畴已使马克思的共产主义思想建立在实证科学的基础上，已经用不着思辨哲学的那种形而上范畴来帮忙了。

#### (四)

综上所述，马克思关于人的本质的思想演变过程与摆脱德国思辨哲学的过程是一致的，这是一个由形而上向形而下转变的过程，而《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是这个转变过程的中间环节。马克思这时的思想还表现出实证性与思辨性的矛盾，即所谓“新的缠住旧的、死的拖拉活的。”思辨的终结也就是实证科学的开始。《德意志的意识形态》用可以用经验加以描述的人去取代那种超验的形而上学所加在人身上的种种规定，从而完成了由思辨哲学向实证科学的转变。

(下转25页)

总之，经济体制改革必须始终坚持社会主义方向，我们要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的影响，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而奋进。

注释：

①④⑩⑪ 江泽民：《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4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

②③ 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单行本，第12页。

⑤ 《列宁选集》第3卷，第255页。

⑥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10页。

⑦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109页。

⑧ 参见方励之给香港《明报》写的《中国的失望和希望》等文。

⑨ 参见《世界经济导报》1989年2月6、20、27日，4月3日。

（本文责任编辑 邹惠卿）

---

（上接41页）

马克思之所以能实现这个转变，是由他个人的实践活动和他研究的课题的性质所决定的。他在主编《莱茵报》期间，接触了大量的形而下的问题，如物质利益问题，民主、自由问题，无产阶级的悲惨处境问题，经济学问题等。这些都是思辨哲学所不能说明的。马克思最初试图用思辨哲学来说明这些形而下的问题，但是行不通，只能另辟蹊径。另外，马克思之所以能实现由形而上向形而下的转变，还因为19世纪的时代精神是实证主义，那是一个摒弃形而上学的时代。如孔德等实证主义者是马克思的同时代人，他们所创立的实证学风无疑影响了信奉思辨哲学的马克思。形而上学所探讨的超验的问题已不是近代人的兴趣所在了。因此我们可以说，时代精神与马克思自身的经历是促使马克思思想转变的重要原因。从《德意志的意识形态》以后，马克思再也不谈论所谓“人的本质”等诸如此类的形而上问题了。

马克思的上述转变说明，在马克思主义看来，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这个“总和”是在现实生活中、在社会实践的基础上形成的。在阶级社会中，这个“总和”集中表现为阶级性，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总和”仍然具有阶级的“痕迹”。脱离历史条件、脱离社会实践活动的抽象人性是一种虚构，是根本不存在的。马克思关于人的本质的学说说明，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和阶级斗争理论并未过时，直到今天，它仍然是我们观察和研究社会现象的基本理论和基本方法之一。

注释：

①⑥⑦⑧⑨⑩⑬⑭⑮⑯⑰⑱⑲⑳㉑㉒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31、1、15、14、9、2、18、18、17、30、31、243、32、48页。

②③④⑤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292—293、270、293、293页。

①②③④⑤⑥⑦⑧⑨⑩⑪⑫⑬⑭⑮⑯⑰⑱⑲⑳㉑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第116、117、80、81、80—81、74、84、50、81、85、73页。

⑰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54页。

⑱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7卷第13页。

（本文责任编辑 涂贇琥 杨小岩）